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3.015

# 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 蒋亚丽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本文分析了媒介化抚育通过学习行为、学校适应等与学习相关的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父母通过亲子电话等媒介化抚育方式实施远程养育,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的适应能力,还能减少迟到、逃学等不良行为,进而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此外,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亲子电话对子女的学习表现影响最为显著。据此,应进一步完善留守儿童家庭的保障制度,加强对农民工父母的亲职教育,增强学校对家庭结构不足的弥补效应,进一步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关键词】**媒介化抚育 农村留守儿童 学习成绩

## 一、问题提出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存在两种倾向:早期研究认为,由于父母外出、亲子分离导致的家庭居住结构不完整会引发一系列问题<sup>[1-2]</sup>;近期的研究则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该种“问题化取向”提出了质疑和反思<sup>[3-4]</sup>,质疑学界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是否存在情感关怀大于科学实证的现象,反思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留守儿童群体独有的问题,还是农村儿童普遍存在的问题。随后,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方面呈现出与农村非留守儿童“趋同化趋势”<sup>[5-7]</sup>。

已有研究从家庭结构视角分析留守儿童问题,认为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不理想是由于父母外出、家庭居住结构不完整所带来的亲子陪伴缺失、父母教育参与缺位所导致。抚育子女最理想

收稿日期:2024-03-10

作者简介:蒋亚丽,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家庭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家庭育儿模式对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研究(课题编号:KJQN202200901)”的阶段研究成果。

的家庭居住模式为父母均在家的核心家庭居住模式,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困境<sup>[8-9]</sup>。

父母外出导致的亲子分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父母与子女分离这一静止不变的事实<sup>[10]</sup>。家庭结构不完整所造成的情感缺位和监管缺失是农村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但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外出的父母能够克服这些问题,使用电子化媒介给予子女情感支持和生活学业引导,在“身体不在场”的情况下,保持“情感”和“精神”在场<sup>[11]</sup>。在一定程度上,智能手机建构的媒介环境为留守儿童提供了“虚拟化”的情感能力和情感代偿<sup>[12]</sup>。

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把关注点放在媒介化抚育与远程母职这一议题上,探讨外出母亲通过电话等媒介手段对子女的远程照料<sup>[13]</sup>,但较少涉及不同外出形态下,父母中外出一方媒介化抚育的作用。国内探讨媒介化抚育与留守儿童成长的研究,多聚焦于媒介与母职新的呈现方式<sup>[14]</sup>、远程抚育的实践和路径<sup>[15]</sup>、构建亲子亲密关系的方式<sup>[16]</sup>、数字技术与亲子情感关系的逻辑<sup>[17]</sup>等方面,缺乏远程抚育对留守儿童影响的效果评估。

研究发现,远程抚育能够为子女提供情感数字补偿,实施远程学习监管,提升子女适应能力。因此,本研究参照以上研究逻辑,建立媒介化抚育、学习监管和学校适应、学习成绩之间的因果链条,分析远程抚育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重庆市2023年留守儿童情况调查数据,着重分析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与学习相关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以及所导致的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异。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依据

### (一)深度媒介化理论

深度媒介化理论(Deep Mediatization)认为,在数字时代,媒介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而成了社会运作的基础设施,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个体实践<sup>[18]</sup>。媒介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除了传递信息,还塑造了人们的认知框架和社会互动方式<sup>[19]</sup>。同时,深度媒介化理论还探讨了媒介对家庭转变产生影响的三个方面。第一,媒介化抚育改变着家庭育儿的方式,媒介化应用的实践使远程抚育成为可能。父母可以利用数字媒介,如视频通话、社交媒体等,进行日常的抚育活动。第二,媒介重新建构和维持着网络环境中的家庭亲密关系。频繁且有规律的媒介沟通有助于降低父母与子女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sup>[20]</sup>。第三,媒介技术的普及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手机和互联网使远程沟通变得更加便捷。父母通过电话、视频通话等方式与子女保持联系,尽管身体不在场,但依然能够参与子女的生活和教育<sup>[21]</sup>。

深度媒介化主要通过虚拟的信息交流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实现虚拟的媒介共现,从而达到传递感情、维持家庭亲密关系的目的<sup>[22]</sup>。它存在三种共现方式(Ordinary Co-presence Routines):仪式性共现(Ritual Co-presence),即家庭成员通过固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通信模式保持联系,如定期的视频通话、生日问候等。这种共现方式通过重复和仪式化的沟通活动,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稳定性。无处不在的共现(Ubiquitous Co-

presence),借助各种通信工具和平台,家庭成员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时段保持交流,使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和即时化。强化型共现(Enhanced Co-presence),通过高级技术手段和多种媒介的结合,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体验;家庭成员可以创造出更加真实和沉浸式的互动场景,更注重提高互动的深度和质量。

由于人口流动造成的父母与子女物理空间分离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国外相关研究中最著名的是对菲律宾母亲的跨国母职(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研究。马迪亚努(Mirca Madi-anou)和米勒(Daniel Miller)在2012年出版的《流动和新媒体》(Migration and New Media)一书中指出,电话或电子邮件成就了菲律宾跨国母亲(Transnational Mothers)想与子女保持联系的愿望,也成了他们之间沟通的唯一渠道<sup>[23]</sup>。随着技术的发展,跨国母亲可以采用更加多元化媒介方式(polymedia)加强与子女的情感联系。

多媒介沟通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还是社会情感传递的表达和诉求<sup>[24]</sup>。媒介化手段都是和母亲的传统抚育子女的职责,也就是传统母职联系在一起<sup>[25]</sup>。多媒体工具甚至缔造了“远程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 from Afar),即便身处异国,母亲依然承担着抚育子女的大量工作。现代化通信设备重新塑造了养育环境和抚育文化<sup>[26]</sup>,使外出的母亲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依然能够与子女建立亲密的关系、辅导子女作业以及引导子女行为,实施远程照料<sup>[27]</sup>。费孝通先生认为,在性别分工的社会里,只有由男女组成的家庭才能担负起所有的抚育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双系抚育。其中,父亲也担负着重要的抚育责任<sup>[28]</sup>。对于外出务工的父亲来说,虽然对子女的抚养行为不如母亲多,但电话里定期问候和日常关心也构建了数字化的亲密家庭仪式,让子女感觉父亲的陪伴从未缺失<sup>[29]</sup>。

## (二)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纵观父母与儿童学习成绩的相关研究,亲子互动都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方学界研究发现,亲子互动的质量和数量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发展,包括行为规范、行为控制、行为习惯和行为结果等<sup>[30]</sup>。父母与子女制定明确、一致和合理的规则,会促进子女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控制,从而减少子女不良学习行为<sup>[31]</sup>。父母对子女进行规律、有序和有效的作业辅导,会促进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提高子女的作业质量和成绩水平<sup>[32]</sup>。

在国内人口迁移与儿童学习成绩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儿童的成绩,还能通过亲子交流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sup>[33]</sup>。与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相比,父母外出打工对子女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亲子互动频率的减少,以及因此导致的学习成绩下降问题。父母外出务工经由亲子互动减少对农村留守儿童成绩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也得到诸多研究的验证<sup>[34-36]</sup>。亲子互动能够提升家庭的亲密度,从而促进儿童的学习投入<sup>[37]</sup>。家庭内部亲子互动还能缓解青少年人际关系困扰<sup>[38]</sup>。

由于父母外出“缺席在场”,理想的家庭沟通环境因空间分离被弱化<sup>[39]</sup>。多元化媒介的出现使亲子通话重新形塑社交网络中的亲子互动,成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手机媒介为亲子互动搭建了信息交流的平台,把处于空间分离的人们连接在了一起<sup>[40]</sup>。它不仅拓展了亲子交流的空间,还延伸了父母对子女的陪伴功能。数字时代亲子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子(女)双方在数字沟通中呈现出的能动性<sup>[41]</sup>。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

田野调查发现,在外地打工的父母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极力保持着与子女的积极沟通,努力弥补物理空间的缺失。先前研究的逻辑链条作出如下论断:父母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监管缺失、亲子交流频率下降,进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如果父母外出务工后,通过移动智能网络竭力弥补“养育不在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形成“不在场养育”的远程亲子陪伴模式,可能会减弱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 媒介化抚育能够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亲子通话的媒介沟通频率越高,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越好。

### (三)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的中介效应

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参与预示着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指标,这些指标又与他们的学习成绩息息相关<sup>[42]</sup>。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外出打工导致的家庭角色缺位,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和学业成绩造成负面影响。父母外出务工所导致的情感缺位和情感忽视,也给留守儿童造成了焦虑、社交边缘化等一系列消极情感社会化结果<sup>[43]</sup>。由于父母外出导致的情感支持缺失是造成儿童阅读成绩不理想的主要原因<sup>[44]</sup>。

家庭支持和亲子关系对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至关重要。家庭提供的支持,包括情感支持和学术支持,与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sup>[45]</sup>。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促进学生养成更积极的学习行为,获得更好的学术成就<sup>[46]</sup>。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导致对儿童的教育参与度较低。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尤其是母亲外出务工对子女的教育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缺乏对子女行为的监管导致留守儿童产生不当学习行为的概率也在增加<sup>[47]</sup>,这些都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处于“养育不在场”的外出务工父母,会通过智能手机的数字代偿方式,给予子女情感支持和数字陪伴,从而营造一种未曾缺失的情感氛围<sup>[48]</sup>。父母通过媒介监督子女的行为,从而维持自身的家长权力<sup>[49]</sup>。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外出务工父母通过摄像头监管子女的学习和行为成为可能。技术辅助下的父母陪伴也更具象化<sup>[50]</sup>。另外,外出务工的父母还会时刻关注子女班级qq群和微信群消息,了解子女的在校表现和学习情况,遇到问题会及时与班主任取得联系,子女表现不好时也能随时打电话沟通引导。至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 媒介化抚育通过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行为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研究表明,学生对学校的良好适应能够显著影响其学业成绩。学生在学校适应方面表现良好也倾向于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更容易融入学校环境,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学习活动,从而改善他们的学业表现<sup>[51]</sup>。对学校环境的积极适应还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提高学业投入,进而促进学习成绩的提升<sup>[52]</sup>。适应能力强的学生往往更愿意面对学习中的挑战,表现出更强烈的学习动机,这对于长期的学业成功至关重要。学校适应还与社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关。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更容易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与教师积极互动,这有助于其获得学术上的支持和资源,对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sup>[53]</sup>。从非认知能力出发考察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影响的因素发现,学校适应等非认知能力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成绩产生显著影响<sup>[54]</sup>。

如果亲子沟通质量较低,则会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同伴关系和学习成绩<sup>[55]</sup>。

远距离沟通由于空间阻隔和对未来的担心,可能展现出来的关系质量甚至比面对面沟通还要高<sup>[56]</sup>。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 媒介化抚育通过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 (四)不同类型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基于父亲单独外出务工、母亲单独外出务工、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三种父母外出形式与父母均在家农村儿童相比,发现父亲单独外出务工和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并没有显示出明显劣势,只有母亲单独外出才会导致子女成绩低于父母均在家的留守儿童<sup>[57]</sup>。母亲单独外出的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发生率显著高于父亲单独外出的留守儿童<sup>[58]</sup>。其他学者的研究基本支持了这一结论<sup>[59]</sup>,稍有不同的是,该研究发现,非留守儿童和仅父亲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最好,其次是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成绩最差的是仅母亲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本文在媒介化养育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效果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父亲远程抚育、母亲远程抚育、父母远程抚育)探讨不同类型的远程养育方式的作用效果<sup>[60]</sup>。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4 在所有外出务工类型中,单独外出务工母亲的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最大。

### 三、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2023年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sup>①</sup>摸排调查数据。重庆地处西南地区,每年有大量的农民工外出东部沿海务工,其具有较为普遍的农民工输出现象,农村留守儿童的样本极具代表性。

本次调查的问卷主要参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的学生问卷<sup>②</sup>,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部分改动。如根据很多学校不再进行成绩排名也不公布学生分数的社会实际,把学生的学习成绩由考试分数操作化为成绩排名自评。另外,添加父母外出务工后与子女每周通电话频率的问题等。调研地点为渝东北和渝东南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10个区县。各个区县发放调查问卷数量占总发放数量的比例,与该区县留守儿童数量占全重庆留守儿童数量的比例相同。每个区县随机抽取留守儿童较多的小学和初中学生填写问卷。调查对象为6-17岁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剔除不合格和填答不完整问卷,最后一共得到3124份问卷。

#### (二)变量测量

本文把媒介化抚育操作化成亲子通话频率,问题设置为“你平均一周和父母通几次电话”,选项为“每天都通电话”“每周3-4次”“每周1-2次”“几乎没有通过电话”。

因变量为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由于学校要求不能公开发布学生成绩和排名,很多被访者

① 本次调查对象为父母有一方外出务工和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双留守儿童。

② 把本问卷得到的初中学生数据单独提出,进行父母外出务工类型和学习成绩的因果分析,结论与基于CEPS数据分析的研究结论一致(许琪,2018;郝明松,2022),也从侧面验证了该次调查数据的质量。

并不知晓也不关注自身成绩,因此在调查中无法获得准确的考试分数,因而采用自评成绩排名代替。在问卷中项目设置为“你目前的成绩在班里处于:不好、中下、中等、中上、很好”。

中介变量为学习行为与学校适应能力。学习行为的问题设置为“我经常迟到”“我经常逃课”“我的父母经常收到老师对我的批评”“班主任老师经常批评我”。以上问题选项设置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学校适应能力的问题设置为“关于学校生活,你是否同意下列说法: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的活动”。中介变量作为潜变量,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CFA)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两个潜变量检测模型的总体拟合优度良好。

表1 学习行为和学校适应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

潜变量	模型拟合指数		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负载量	
学习行为	RMSEA	0.144	迟到	0.552***
	P(RMSEA≤0.05)	0.000	逃课	0.689***
	CFI	0.930	老师批评	0.594***
	SRMR	0.037	班主任批评	0.486***
学校适应能力	RMSEA	0.034	同学友好	0.703***
	P(RMSEA≤0.05)	0.839	容易相处	0.600***
	CFI	0.995	班风良好	0.563***
	SRMR	0.010	参加学校活动	0.289***

注:\*\*\*  $p < 0.001$ 。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与母亲谈心的频率<sup>①</sup>。家庭经济状况设置为“目前你家经济条件如何”,选项为“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比较富裕”“很富裕”。与母亲谈心的情况问题设计为“你母亲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的频率: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朋友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情、你的心事或烦恼”,选项设置为“从不”“偶尔”“经常”。采用因子分析方法降维提取因子命名为亲子交流。

对总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机抽取的调研对象中留守儿童里面最多的是父母都不在家的,占59.6%;其次是父亲外出母亲在家的,占比21.6%;最少的是母亲外出父亲在家的留守儿童,占3.7%。外出务工父母虽然没办法在家监管子女,但会通过电话、网络等媒介化抚育方式进行远程亲子陪伴,总体来看,57%的父母会每周至少与子女通话3-4次,但仍有10.9%的父母几乎一周都不与子女通一次电话。

<sup>①</sup> 大量研究发现,亲子交流能够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为了避免亲子交流和亲子通话的效应出现混淆,亲子交流作为控制变量被纳入模型。

表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3124)

变量	类别/指标	父亲远程抚育	母亲远程抚育	父母远程抚育
亲子通话频率	经常通话	59.61%	49.32%	54.29%
	较少通话	40.39%	50.68%	45.71%
留守儿童学习成绩	不好	7.66%	14.97%	7.68%
	中下	17.1%	21.09%	17.2%
	中等	43.4%	37.41%	43.13%
	中上	25.8%	23.13%	25.80%
	很好	6.10%	3.4%	6.18%
性别	女	48.8%	47.30%	49.67%
	男	51.2%	52.7%	50.33%
年龄	均值	12.681	12.917	12.603
	标准差	2.483	2.093	2.556
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	32.65%	45.89%	28.15%
	不困难	67.35%	54.11%	71.85%
学习行为	均值	0.022	0.156	-0.029
	标准差	1.750	1.674	1.349
学校适应	均值	0.008	-0.445	-0.015
	标准差	1.777	1.913	1.744
父亲受教育程度	均值	9.287	8.517	9.800
	标准差	3.195	3.130	3.188
母亲受教育程度	均值	8.473	8.158	8.888
	标准差	2.399	3.086	2.402
与母亲谈心	均值	0.219	-0.927	-0.148
	标准差	1.860	2.133	1.920

本文根据父母外出的类型,把留守儿童分为母亲在家父亲远程抚育、父亲在家母亲远程抚育、父母远程抚育三类。对比三个子样本,打电话频率最高的是父亲远程抚育的留守儿童,父亲经常打电话的比例占到了59.61%。打电话频率最低的是母亲远程抚育的儿童,经常打电话的频率只占到49.32%。对父母外出和通话频率两个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F值为4.795,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实施远程抚育的父母不同,亲子通话的频率也具有显著差异。

### (三)分析策略

本文主要考察亲子通话的媒介化抚育方式是否能够通过影响与学习相关的一些行为,进而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基于此,先构建有序回归模型,分析通话频率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的影响差异。然后根据父母外出的远程抚育类型,把总样本分为母亲在家父亲远程抚育、父亲在家母亲远程抚育、外出的父母远程抚育三个子样本,具体探讨远程抚育对于哪类留守儿童学习作用效果最为明显。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科学严谨,本文采用多元有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中介效应检验采用KHB和Bootstrap相结合的方法,数据抽取放回次数设置为1000。

## 四、研究发现

### (一)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本部分分析总体样本中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及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因此共构建了四个模型。模型1为基准模型,在控制了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分析亲子通话频率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直接效应。模型2-3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与学习相关的两个中介变量,模型4则为纳入全部变量的全因素模型。

综合分析4个模型的数据结果发现,年龄、性别、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4个控制变量,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影响较为稳健。数据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人口学因素和家庭因素后,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排名越靠前。女孩显示出比男孩更强的学习能力,成绩也更好。在家庭背景因素中,家庭越富裕,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越好,这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sup>[61-62]</sup>,再次验证了经济基础对学习成绩的强有力作用。在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父亲而非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从基准模型1可以看出,外出务工的父母与子女通话频率越高,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越好。如果外出务工父母每周至少与子女通话3-4次,那么就能够显著提升其学习成绩,假设1被验证。在模型2、3、4中,控制了通话频率后,逃学或迟到等负面学习行为、良好的学校适应性,都能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排名产生显著影响。逃学或迟到等负面行为越少,成绩排名越靠前。可见,父母通过打电话这种媒介化抚育方式,能够显著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父母经常与子女联系能减少子女逃课、迟到、受老师批评等不良行为。除此以外,父母经常的远程电话关爱还能显著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的适应性。这些学习行为和学习品格又直接影响着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

在父母与子女谈心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的父母打电话越频繁,越能够提升子女学业成绩。这种仪式性共现家庭的亲密感即便只是寥寥几句问候,依然能让子女体会到父母的关爱<sup>[63]</sup>。把父母远程抚育方式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结果发现,该变量的变化对模型结果并无显著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父母外出务工造成对子女不能及时进行监管的情况,在移动互联网络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养育的不在场”逐渐转变成了“不在场的养育”,父母即使不在家,通过电子媒介对子女的养育和监管也从未缺席。假设2、假设3得到验证。

表3 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直接与间接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基准模型	学习行为	学校适应	全模型
年龄	-0.080*** (0.014)	-0.087*** (0.014)	-0.065*** (0.014)	-0.059*** (0.014)
性别	-0.212** (0.065)	-0.151* (0.066)	-0.224*** (0.066)	-0.161* (0.067)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29+ (0.015)	0.020 (0.016)	0.034* (0.016)	0.027+ (0.016)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32** (0.012)	0.030* (0.012)	0.033** (0.012)	0.034** (0.012)
家庭经济状况	0.248*** (0.057)	0.236*** (0.057)	0.240*** (0.057)	0.237*** (0.058)
与母亲谈心	0.059** (0.019)	0.070*** (0.019)	0.003 (0.021)	-0.012 (0.021)
远程抚育类型(以父母均在家的非远程抚育为参照)				
父亲远程抚育	0.046 (0.105)	0.053 (0.106)	0.046 (0.106)	-0.001 (0.108)
母亲远程抚育	-0.212 (0.207)	-0.185 (0.208)	-0.179 (0.208)	-0.265 (0.214)
父母远程抚育	-0.016 (0.092)	-0.003 (0.092)	-0.041 (0.092)	-0.060 (0.094)
通话频率	0.235** (0.073)	0.213** (0.073)	0.199** (0.073)	0.158* (0.075)
学习行为		-0.202*** (0.023)		-0.196*** (0.024)
学校适应			0.187*** (0.021)	0.144*** (0.023)
cut1	-2.383*** (0.293)	-2.609*** (0.297)	-2.246*** (0.297)	-2.308*** (0.304)
cut2	-0.934** (0.288)	-1.139*** (0.292)	-0.771** (0.292)	-0.793** (0.299)
cut3	1.039*** (0.288)	0.866** (0.291)	1.230*** (0.293)	1.280*** (0.300)
cut4	3.039*** (0.295)	2.885*** (0.298)	3.269*** (0.300)	3.351*** (0.307)
N	3124	3124	3124	312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二)不同类型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亲子通话的远程抚育建立在父母外出务工的基础上,只有外出务工的父母才固定地与子女保持通话。为了考察不同外出类型的父亲、母亲与子女通话频率对子女成绩的影响,本文把总样本分为母亲在家父亲远程抚育、父亲在家母亲远程抚育及父母远程抚育三种类型。为了缩减篇幅和简化模型,每类子样本都只保留基准模型和全模型进行分析。

表4 不同类型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5 父亲远程抚育		模型6 母亲远程抚育		模型7 父母远程抚育	
	基准模型	全模型	基准模型	全模型	基准模型	全模型
年龄	-0.076*	-0.061*	-0.218*	-0.200*	-0.079***	-0.063***
	(0.030)	(0.031)	(0.091)	(0.101)	(0.018)	(0.018)
性别	-0.294*	-0.250*	-0.252	-0.051	-0.122	-0.091
	(0.137)	(0.140)	(0.414)	(0.452)	(0.085)	(0.088)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62 <sup>+</sup>	0.052	0.089	0.053	-0.014	-0.009
	(0.035)	(0.036)	(0.079)	(0.082)	(0.020)	(0.021)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34	0.037	-0.018	0.004	0.029 <sup>+</sup>	0.030 <sup>+</sup>
	(0.027)	(0.027)	(0.073)	(0.074)	(0.015)	(0.015)
家庭经济状况	0.181	0.090	0.006	0.154	0.280***	0.310***
	(0.117)	(0.120)	(0.346)	(0.364)	(0.074)	(0.076)
与母亲谈心	0.019	-0.047	0.076	-0.033	0.052*	0.002
	(0.041)	(0.046)	(0.108)	(0.120)	(0.025)	(0.027)
通话频率	0.130	0.124	0.501	0.505	0.288**	0.186*
	(0.151)	(0.154)	(0.449)	(0.468)	(0.094)	(0.097)
学习行为		-0.230***		-0.174		-0.180***
		(0.044)		(0.141)		(0.035)
学校适应		0.119*		0.218		0.149***
		(0.047)		(0.150)		(0.030)
cut1	-2.583***	-2.824***	-4.072**	-3.567*	-2.528***	-2.311***
	(0.603)	(0.634)	(1.327)	(1.456)	(0.373)	(0.387)
cut2	-0.950	-1.074 <sup>+</sup>	-2.960*	-2.396 <sup>+</sup>	-1.143**	-0.863*
	(0.589)	(0.619)	(1.298)	(1.438)	(0.367)	(0.382)
cut3	1.048 <sup>+</sup>	1.047 <sup>+</sup>	-1.181	-0.511	0.789*	1.156**
	(0.590)	(0.619)	(1.270)	(1.419)	(0.366)	(0.382)

(续表)

	模型5 父亲远程抚育		模型6 母亲远程抚育		模型7 父母远程抚育	
	基准模型	全模型	基准模型	全模型	基准模型	全模型
cut4	3.177*** (0.607)	3.249*** (0.637)	1.526 (1.369)	2.143 (1.507)	2.743*** (0.375)	3.177*** (0.391)
N	745	745	99	99	1880	188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模型5中母亲在家,外出务工父亲通过远程打电话抚育的农村留守儿童,通话频率并不能对其学习成绩产生显著性影响。模型6中父亲在家,母亲实施远程抚育的农村留守儿童,其学习成绩排名的高低也与母亲打电话的频率无关,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模型5中父亲远程抚育对子女成绩影响不大,是因为诸多农村家庭依然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母亲主要负责看护和监管子女的学习,只要母亲在家,父亲打电话的频率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如此就要为模型6中母亲远程抚育也无法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寻找另外一种解释。

对父母外出务工和通话频率做交叉分析发现,单独外出务工的母亲,经常给子女打电话的比例只占到49.3%,另有21.9%的母亲几乎不与孩子联系。根据田野调查的实际情况反馈,不与子女联系的外出打工母亲,要么是已经与孩子父亲离婚,要么是正处于准备离婚的阶段。甚至在农村留守儿童里面,形成了父母离婚的亚群体现象。虽然无法获取父母离异导致母亲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确切比例,但重庆市毛坝乡的统计数据显示,该乡共有留守儿童259人,其中单亲家庭儿童人数为103人,占该乡留守儿童的39.7%。

在三个子样本中,只有双方都外出务工的父母打电话给子女,才显示出与总样本相似的显著性,年龄、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依然显示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的显著性。与总样本相比,在控制通话频率的情况下,学习成绩的性别差异不复存在。只有母亲在家的外出务工家庭,女孩的成绩才显著高于男孩。可见,母亲陪伴对女孩的影响大于对男孩的影响。

### (三)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母亲在家父亲远程抚育和父亲在家母亲远程抚育的亲子通话并不能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发挥显著作用,因此该部分只计算父母均外出样本变量的中介效应。

表5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点估计值		系数		Bootstrap1000次的95%置信区间		所占比例
	S.E.	Est.S.E.	P-Value	Lower	Upper		
总效应	0.311	0.096	3.25	**	0.124	0.498	/
直接效应	0.203	0.096	2.12	*	0.015	0.391	/
总中介效应	0.108	0.024	4.42	***	0.059	0.155	/
学习行为	0.037	0.015	/	/	/	/	11.92
学校适应	0.070	0.018	/	/	/	/	22.67

注:\*\* p < 0.01, \*\*\* p < 0.001。

亲子通话这一媒介化抚育方式,对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能够产生直接作用,外出父母亲子通话频率越高,子女学习成绩排名越靠前。学习行为、学校适应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具有非常明显的显著性。总体而言,亲子通话一共解释了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 34.59% (11.92%+22.67%=34.59%) 的方差。由两个中介路径来看,学校适应解释了 22.67%,学习行为解释了 11.92%。因此,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最大的是学校适应,其次是学习行为。

## 五、结论与讨论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留守儿童家庭的远程抚育成为可能,将亲子物理上的分离转化为一种虚拟的共在。深度媒介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上述转变的框架,强调信息技术在家庭成员间情感联系和亲密关系构建中的作用。通过远程抚育行为,即使在物理上相隔千里之遥,农民工父母仍然能够与子女保持联系,共同建立家庭的仪式性共在。

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父母与子女的通话频率与留守儿童的学习行为、学校适应性和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即便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规律的媒介沟通也能营造一种仪式性的家庭共在感,从而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此外,本研究也发现,与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相比,只有双方都外出务工的父母通过电话与子女保持高频率联系时,才能显著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即便有些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不善于与子女交谈,但经常打电话这一行为本身就会营造一种家庭亲密关系的仪式性共现,使其子女的学习成绩优于父母不经常打电话的农村留守儿童。这也从定量研究的角度,支持了媒介化抚育会对子女的行为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影响的结论<sup>[64-65]</sup>。

三种类型媒介化抚育与父母均在家的农村儿童抚育相比,只有双方都外出务工的父母打电话的频率才能显著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父母打电话频率越高,农村留守儿童与学习相关的行为和品质越好,成绩排名越靠前。外出打工的父母可以通过便利的电子媒介随时随地与子女保持联系,对子女实施远程的生活照料和学习监管,让子女觉得父母并未远离。尽管媒介化抚育和“在场”的面对面抚育效果存在差异,但信息化设备会产生对父母被迫外出这一无奈情形下的补偿效应。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村留守儿童并未感觉到自己与非留守同学有任何不同,也不愿被人贴上“留守儿童”的标签。外出父母的远程抚育行为,让农村留守儿童感到父母的爱并未缺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家庭居住结构改变所带来的留守儿童成绩不理想的矛盾。

单独外出务工母亲的远程抚育并不能显著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而且三种外出类型中单独外出务工母亲给子女打电话的频率最低。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母亲单独外出务工的情况多发生在离异家庭或夫妻感情失和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会慢慢淡化与整个家庭的亲密关系,即便给子女打电话,更多地也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仪式化共现,不能达到随时联系无处不在共现的程度。

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一方面,可以加强

对留守儿童父母的培训和引导,提升其监管能力和情感关怀技巧,以更好地履行其职责。此外,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通信网络和技术支持体系,为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通话提供便利和保障,鼓励父母与子女保持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留守儿童家庭的支持和帮助,促进媒介化抚育由仪式性共现向无处不在共现及强化型共现深入。例如,可以建立健康、积极的家庭互动机制,鼓励父母在工作之余尽可能多地与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加大对留守儿童家庭的关爱和支持力度,提供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帮助家长更好地履行抚育责任,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此外,还可以加强对留守儿童学校的支持和帮助,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资源。加强对学校教师的培训和管理,增强其教育教学水平和服务意识,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具个性化、关爱式的教育服务。

### [ 参 考 文 献 ]

- [1] 丁杰 吴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
- [2] 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 [3][9][10] 唐有财 符平:《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载《人口学刊》,2011年第5期。
- [4] 《农民工流动对儿童的影响课题报告》, <https://www.doc88.com/p-3157185117985.html>
- [5][34][47][57][62] 许琪:《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载《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 [6][35][54][59] 郝明松:《父母外出模式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载《人口学刊》,2022年第5期。
- [7][60] 段成荣 吕利丹 王宗萍:《留守儿童的就学和学业成绩——基于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的双重视角》,载《青年研究》,2013年第3期。
- [8][42][61] 吴愈晓 王鹏 杜思佳:《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 [11][14][27] 肖索未 汤超萍:《流动的母职:城乡迁移中的母职协商》,载《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2期。
- [12][39][50] 王清华 郑欣:《数字代偿: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载《新闻界》,2022年第3期。
- [13][23][24][25][26] Madianou, M., Miller, D..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64 – 68.
- [15][20][64] 甘雨梅:《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
- [16][41] 朱丽丽 李灵琳:《基于能动性的数字亲密关系:社交网络空间的亲子互动》,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 [17][29][49][63][65] 胡春阳 毛荻秋:《看不见的父母与理想化的亲情:农村留守儿童亲子沟通与关系维护研究》,载《新闻大学》,2019年第6期。
- [18] Couldry, N., Hepp, A..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p.137 – 145.
- [19] Hepp, A.. Deep Mediat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65 – 89.
- [21] Ling, R.. New Tech, New Ties: How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Reshaping Social Cohes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pp.187 – 198.
- [22] Nedeleu, M., Wyss, M.. ‘Doing Family’ through ICT – mediated Ordinary Co – presence: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Romanian Migrants in Switzerland, Global Networks, 2016, (2).

- [28] 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5页。
- [30] Bornstein, M. H., Lansford, J. E.. Parenting, In Bornstein, M. H. (Ed.), Handbook of Cultural Developmental Scienc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0, pp. 259 – 277.
- [31] Patterson, G. R., DeBaryshe, B. D., Ramsey, 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m Psychol, 1989, (2).
- [32] Cooper, H., Nye, B., Charlton, K., Lindsay, J., Greathouse, S.. The Effects of Summer Vacation on Achievement Test Scores: A narrative and Meta – analytic Review,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0, (3).
- [33][36] 周 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期望、亲子交流与儿童发展》,载《青年研究》,2013年第3期。
- [37] 刘成伟 王茂文 唐敏燕:《流动儿童亲子沟通与学习投入:家庭亲密度与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2年第8期。
- [38] 张雅怡 等:《视屏时间对青少年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亲子沟通和亲子亲密度的链式中介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年第3期。
- [40] Liu, Y., Fan, J.. Culturally Specific Privacy Practice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Privacy Boundary Permeability Management in Photo Sharing by American and Chinese College – Age Us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1).
- [43] 孟亚男 张 璨:《父母情感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留守表述的情感社会学分析》,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8期。
- [44] 杜长宏 王焯晖:《父母情感支持对学生阅读表现的影响机制探究——以PISA2018我国4省市数据为例》,载《中国考试》,2020年第11期。
- [45] Topor, D. R., Keane, S. P., Shelton, T. L., Galkins, S. D.. Parent Involvement and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a Multiple Mediation Analysis, J Prev Interv Community, 2010, (3).
- [46] Rathee, N., Kumari, P..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s, 2022, (53).
- [48] Xiang, B.. How Far Are The Left – behind Left Behind? A Preliminary Study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Space & Place, 2010, (13).
- [51] Bernadette, S., Colon, Y., Esparza, P.. The Role of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Gender in the Academic Adjustment of Latino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05, (6).
- [52] Wentzel, K. R.. Peer Relationships,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School, In Elliot, A. J., Dweck, C. S. (Eds.), Handbook of Competence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5, pp. 279 – 296.
- [53] Byun, S. Y., Park, H.. The Academic Success of East Asian American Youth: The Role of Shadow Education, Sociol Educ, 2012, (1).
- [55] Collins, W. E., Newman, B. M., McKenry, P. C.. Intrapyschic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Related to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in Stepmother and Stepfather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95, (4).
- [56] Kelmer, G., Rhoades, G. K., Stanley, S., Markman, H. J.. Relationship Quality, Commitment, and Stability in Long – distance Relationships, Family Process, 2013, (2).
- [58] 邵美玲 张 权:《父母迁移模式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载《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彦)